Globethics Repository



文化理論與基督宗教研究——神學論題引介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AI, Pai-chiu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Download date	2026-11-16 18:56:43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539

文化理論與基督宗教研究

——神學論題引介

賴品超

主題策劃

一、導言

對於現象學的神學轉向，[1]漢語學界已有一定程度上的關注。[2]這可以說是哲學界的宗教轉向的一部分，而與此稍為有別的是，近十年在文化理論界也出現了一種類似的宗教／神學轉向。[3]相比於現象學的神學／宗教轉向，文化理論界的宗教／神學轉向，也許更為可觀，並且影響更為廣泛和深遠，更值得漢語基督宗教研究界所重視；然而在漢語神學界的討論，則相對來卻較為零碎及初步。[4]本期主題一方面介紹西方學界中的文化理論與神學的互動，另一方

1. 參 Dominique Janicaud, Jean-François Courtine, Jean-Louis Chrétien, Michel Henry, Jean-Luc Marion, & Paul Ricoeur,《現象學與「神學轉向」：法語界的辯論》(*Phenomenology and the Theological Turn: the French Debat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參曾慶豹編，《現象學與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7）。此外，二〇一〇年十月在上海舉行的「現象學與當代神學」的會議，對相關問題有進一步的探討。
3. 雖然一些重要的文化理論家也被稱為哲學家，但哲學界的宗教轉向所包括的哲學家，往往是指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勒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德里達（Jacques Derrida）、馬西昂（Jean-Luc Marion）等學者。參Hent de Vries，《哲學與宗教轉向》（*Philosophy and the Turn to Religion*;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有別於在文化理論界所突出的齊澤克（Slavoj Žižek）、塞杜（Michel de Certeau）、巴迪烏（Alain Badiou）等。
4. 參賴品超，〈文化研究與神學：一個後蒂利希的觀點〉，載陳家富編，《蒂利希與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6），頁 387-411；〈從文化神學再思漢語神學〉，載《道風》29（2008），頁 77-102。

面也初步探討這些文化理論、尤其是它們與神學界的互動，對於漢語基督宗教研究、尤其漢語神學的意義。

本文將先交代文化理論的宗教／神學轉向，之後再勾勒西方神學界對文化理論的吸納，最後嘗試指出文化理論與神學在西方學術界的互動對漢語神學的意義，其中包括對漢語神學的合法性、文化性及公共性的思考。

二、文化理論的宗教轉向

一般來說，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比較喜歡採用日常生活中的素材來分析，尤其是較為「新潮」或「通俗」的文化媒介（或說文化再現[cultural representations]），如通俗小說、流行曲、電影、漫畫、動畫、廣告、主題公園、電子遊戲、甚至塗鴉（graffiti），因此它經常給人的一個印象是十分世俗，與宗教研究似是南轅北轍。然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情況出現了明顯的改變，在文化研究中越來越多是以宗教性的事物為素材，宗教研究界也越來越多採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或進路，文化研究與宗教研究／神學之間的交涉日益頻繁及深化。[5]

文化理論家對宗教的日益重視，既有一些個人的宗教取向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學術上的原因，以及社會文化現實上的考量。這些文化理論學者中，有一些是有明顯的個人宗教背景，例如塞杜（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本身是耶穌會修士，但這算是頗為例外的，因為大多數的文化理論家，即使是對基督宗教有很多討論的，本身並不是正式的教徒。例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瓦蒂莫（Gianni Vattimo）及傑拉特（René Girard），皆曾深入討論基督論的問題；然而在這三人之中，齊澤克是唯物論的共產主義

5. 參賴品超，〈文化研究與神學〉，頁 390-391。

者、是無神論者而不是基督宗教徒；瓦蒂莫雖然在年青時曾經是熱心的天主教徒，但及後對教會保持距離；而較為例外和特別的是傑拉特，他是透過研究而變為信仰基督宗教、甚至成為天主教徒。[6]對於漢語基督宗教研究界來說，類似傑拉特的例子並不陌生，但在西方學界則甚為罕見。

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在最近十年，出版了好幾本由文化理論學者撰寫的有關使徒保羅（尤其他的政治神學）的書。若果不知道作者的個人背景而單看這些書名，還以為是一般的《聖經》學者或神學家所寫的《聖經》研究的書籍。其中包括巴迪烏（Alain Badiou）的《聖保羅：普遍主義的基礎》（*Sain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trans. Ray Brass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陶卜斯（Jacob Taubes）的《保羅的政治神學》（*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Paul*; trans. Dana Hollan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阿崗本（Giorgio Agamben）的《仍在的時間：對〈羅馬書〉的評註》（*The Time that Remains: A Commentary on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trans. Patricia Dile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卡普托（John D. Caputo）及阿爾柯芙（Linda Martín Alcoff）合編的《聖保羅在哲學家之間》（*St. Paul among the Philosophers*;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等。[7]這些討論，很快便引起了漢語學界中的文化研究學者

6. 參Frederiek Depoortere，《後現代哲學中的基督：瓦蒂莫、傑拉特及齊澤克》（*Christ in Postmodern Philosophy: Gianni Vattimo, René Girard, and Slavoj Žižek*; London: T & T Clark, 2008），頁 144。
7. 對這觀點的綜合評析，可參Douglas Harink編，《保羅、哲學與神學政治學的視域：與阿崗本、巴迪烏、齊澤克等人的批判交往》（*Paul, Philosophy, and the Theopolitical Vision: Critical Engagements with Agamben, Badiou, Žižek, and Others*; Eugene, Oregon: Cascade Books, 2010）。

的關注；[8]至於漢語神學界，曾慶豹也曾稍為提及，但在提出這些新近的討論的旨趣是政治哲學而非神學之後，文章很快便轉到上一代的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等，而不是集中討論這些較為新近的著作。[9]然而，這些對保羅、尤其《羅馬書》的討論，雖然在目的上是出於對政治哲學的興趣，但也不能否認，這些討論在內容上仍是針對神學，或說有關於基督宗教研究。可以說，這些文化理論學者之對保羅發生興趣，正是因為他們在使徒保羅身上找到對當代社會政治的相關性。

以齊澤克為例，他曾出版不少論著直接討論有關基督教、信仰以至神學的問題，[10]此外，齊澤克的一些書，也間接指向宗教，例如《因為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做的》，[11]便是暗引《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34 節所記，耶穌在十架上所說的「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和合本）。有些在書名上並不明顯地與基督宗教有關，也有一定的內容是關於神學的。[12]作為一個無神論者，齊澤克不僅熱衷於神學討論，甚至開宗明義地表示，作為一個唯物者，他發現基督宗教中有些遺產是十分有價值的，並且值得去努力爭取和奮鬥。[13]他後來更進一步說，「我在此所宣稱的，不僅是

8. 參朱元鴻，〈保羅復興：當代基進政治的新聖像？〉，載《文化研究》3（2006），頁 205-229。
9. 參曾慶豹，〈解構與十架神學〉，載《道風》29（2008），頁 223-248。
10. 例如Slavoj Žižek，《玩偶與侏儒：基督宗教的逆反核心》（*The Puppet and the Dwarf: The Perverse Core of Christian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3）；《論信念》（*On Belief*;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1. 例如Slavoj Žižek，《因為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做的：享樂作為政治因素的》（*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London: Verso, 1991, 2008）；中譯：斯拉沃熱·齊澤克著，郭英劍等譯，《因為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樂》（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12. 例如在Slavoj Žižek，《視差之見》（*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9）中有一章談〈唯物論神學的構建模組〉（Building Blocks for a Materialist Theology）。
13. Slavoj Žižek《易碎的絕對：基督教遺產為何值得奮鬥？》（*The Fragile Absolute: Or, Why is the Christian Legacy Worth Fighting For?*; London: Verso, 2000, 2008）；中譯：斯拉沃

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物論者，而基督宗教的顛覆性核心也可以從一個唯物論的進路切入；我的論題是更為強烈的：這核心是只有唯物論者才能切入——並且，反過來說，要成為一個真正的辯證唯物論者，應要透過基督教的經歷。」[14]他最重視的，就是基督宗教的倫理革命中的共產主義核心。[15]在他看來，此顛覆性核心最清楚體現在保羅身上，因為保羅是一個激進的猶太人，保羅的書信並不着重耶穌生平的細節，只肯定了耶穌的死和復活，而保羅真正關注的卻是建立一個新群體；保羅不僅顛覆了猶太教的傳統，更也將基督宗教從猶太教的一個小教門提升至一個普世宗教。[16]對於致力進行意識形態批判、反對資本主義並又拒絕犬儒的齊澤克來說，這樣的保羅正是他所嚮往的，而他甚至自稱為「保羅式唯物論者」（Paulinian Materialist）。[17]事實上，在神學的諸領域中，齊澤克最感興趣的仍是政治神學。他除了自撰文章談政治神學外，[18]更與激進正統（Radical Orthodoxy）的代表人物米爾班克（John Milbank）合著有關政治神學／哲學的書，[19]二者更不時在政治神學或說神學與政治的討論中交鋒。[20]

熱．齊澤克著，蔣桂琴、胡大平譯，《易碎的絕對——基督教遺產為何值得奮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14. Žižek，《玩偶與侏儒》，頁 6。
15. Slavoj Žižek，〈後記：基督宗教的反書〉（Afterword: The Counterbook of Christianity），載Marcus Pound，《齊澤克：一個(很)批判性的導引》(*Žižek: A [Very] Critical Introduction*;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2008），頁 145-156。
16. Žižek，《玩偶與侏儒》，頁 9-10。
17. 參Depoortere，《後現代哲學中的基督》，頁 97。
18. 例如Slavoj Žižek, Eric L. Santner & Kenneth Reinhard，《鄰人：政治神學三探》（*The Neighbor: Three Inquiries in Political Theolog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9 參 Slavoj Žižek & John Milbank，《基督的怪異性：悖論抑辯證？》（*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 Paradox or Dialectic?*; ed. Creston Davi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9）。
20. 參Creston Davis, John Milbank & Slavoj Žižek編，《神學與政治性：新的辯論》（*Theology and the Political: The New Debate*;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齊澤克的例子也許反映出，由於文化理論家對當代的文化、社會、政治等議題的關注，加上基督宗教在西方社會文化中的角色，對基督宗教的政治與文化的含意有所關注，可說是十分自然的。事實上，在他們的文化理論中，不少是肯定日常生活文化的宗教性。[21]至於近年對宗教或神學的興趣的明顯提升，也許是由於發現宗教對文化、社會以至政治的重要性，尤其宗教對當代社會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是日益重要，而非如某些社會學家早年所預測的，在世俗化的大潮流下宗教的影響力將日漸消失。因此，一些文化理論家，在批判資本主義的時候，又或在思考顛覆主流文化的時候，很容易想到基督宗教在歷史上曾是顛覆主流文化的重要力量，而基督宗教的一些信念更可以批判及／或抗衡資本主義。

對文化研究的神學回應

由文化研究的崛興帶來對文化的嶄新理解，吸引了一些對文化神學有所關注的神學家，其中包括坦納（Kathryn Tanner）。她比較仔細地交代當代的文化理論對文化的觀念與之前的種種理論有何不同，而這種對文化的觀念又如何有助重新思考神學的本質與任務。[22]此外，當代神學中的激進正統派，出於其對當代文化的關注，自然地與當代文化理論有所交涉。除了與齊澤克展開辯論的米爾班克外，激進正統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沃德（Graham Ward），也在神學與文化理論的對話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沃德除了在

21. 參朱大成，《文化的宗教性：本雅明、伽達默爾、勒維納斯的文化理論》（香港：道風書社，2010）。
22. 參Kathryn Tanner，《文化理論之種種：神學的一個新議程》（*Theories of Culture: A New Agenda for Theology*;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7）。另參賴品超，〈從文化神學再思漢語神學〉，頁 85-89。詳參主題內劉利宇博士的文章〈坦納的文化理論及它對當代漢語神學的應用〉。

他的眾多著作中展示出神學與文化理論的結合外，[23]更在其神學方法論中坦然承認，他要集中討論的問題是宗教實踐能否及如何促成文化轉型，而他對此問題的思考是受眾多文化理論家的啟迪。[24]

由於文化理論家中不少是具有馬克思主義背景，因此尤其重視文化中的權力關係或說是文化政治學（cultural politics），尤其關注的是文化上的弱勢社群，包括勞工階層、女性、被殖民者、同性戀者等。以爭取性別平等為目的的女性主義（feminism），以及對殖民主義進行批判及反擊的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成為文化研究中的兩個重要的領域。不少學者曾從女性主義的視角批判地審視基督宗教，而女性主義神學也早已成為當代神學的一個重要部分。相對來說，後殖民神學的發展則較為滯後。雖然基督宗教在其宣教事業上，似乎是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有着糾纏不清的關係，理應也從後殖民的視角批判地審視及反思基督宗教，例如研究傳教士對當地文化及宗教的詮釋，有沒有後殖民理論家薩義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所批判的「東方主義」的流弊。[25]此外，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有不少的處境神學運動，都是帶有反殖民的味道。然而，真正明顯地採用後殖民的理論來進行神學反思，不僅反思「西方」的神學傳統、甚至反思亞非拉等

23. 參Graham Ward，《神學與當代批判理論》（*Theology and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2000）；《上帝的諸城》（*Cities of God*; London: Routledge, 2000）；《作門徒的政治：成為後物質的市民》（*The Politics of Discipleship: Becoming Postmaterial Citizens*;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9）。
24. Graham Ward，《文化轉型與宗教實踐》（*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ligious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另參賴品超，〈從文化神學再思漢語神學〉，頁 91-99。
25. 參賴品超，〈李提摩太對大乘佛教的回應：從後殖民對東方學的批判著眼〉，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0.3（2010），頁 30-39。

地的處境神學運動的，則是比較近年的事情。[26]其中也有一些神學家嘗試將文化理論中的女性主義及後殖民理論結合運用於基督宗教研究，而美籍華人神學家郭佩蘭（Kwok Pui-lan）便是其中一位比較著名的例子。[27]

三、對漢語基督教研究的意義

由以上的介紹可見，在西方學界，文化理論或文化研究界與宗教學界或神學界，已展開了頻繁而深入的互動。二者之間展開多彩多姿的對話，並非出於神學界一廂情願的單戀、或單向的採用一種拿來主義借用文化研究的現成理論來處理神學的問題，而是也有出自文化理論家主動的討論基督宗教（包括神學的問題），並積極的與神學家展開對話或辯論。

漢語神學既是一場神學運動，也是一場文化運動。[28]這不僅是由於漢語神學的早期倡導者經常與「文化基督徒」的稱號聯想在一起；而漢語基督宗教研究在當代中國的出現，可說是與中國當代文化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這是因為，漢語神學的崛起是緊貼着「文化熱」的出現，而對基督宗教的研究也往往被理解為對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至於高舉學術性及文化性的漢語神學，在其展開神學論述時，也自不免會涉及與中國文化界的對話。那麼，對於漢語學界、尤其漢語的基督宗教研究界來說，西方神學界與

26. 參Catherine Keller, Michael Nausner & Mayra Rivera編，《後殖民諸神學：神性與帝國》（*Postcolonial Theologies: Divinity and Empire*; St. Louis, Missouri: Chalice, 2004）。其中有一篇文章對亞洲神學作的批判性反省尤為深刻，參Namsoon Kang，〈誰／甚麼是亞洲的？對東方主義及新東方主義的一個後殖民神學解讀〉（Who/What Is Asian? A Postcolonial Theological Reading of Orientalism and Neo-Orientalism），頁 100-117。
27. 《基督教思想評論》第 11 輯（2010）有數篇相關文章可供參考。
28. 參Lai Pan-chiu & Jason Lam編，《漢語基督神學：當代中國的一場神學暨文化的運動》（*Sino-Christian Theology: A Theological Qua Cultural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ankfurt-am-Main: Peter Lang, 2010）。

文化理論界的這些跨學科的學術討論，又有甚麼意義？初步看來，似乎最少包括以下數點。

首先是漢語神學的合法性。漢語神學的倡導者所標榜的，是一種存在於大學等學術機構的、學術的、人文的神學，甚至是可以容讓非教徒的參與的神學討論，而不是局限在教會體制內的神學。依此而言，西方學界的文化理論家參與神學討論，正好展示出此一種可能性，因為這些參與在神學討論的文化理論家，很多本身不是教徒、更不是教會的神學家。換言之，一種在教會外的神學論述，並非如想像中的那樣是當代中國大陸所獨有。此外，正如葛斯高（Adam Kotsko）在討論完為何齊澤克會致力討論神學問題後，他進一步提出，相對於那些堅持神學一定要屬於（of）教會和為着（for）教會的神學家而言，齊澤克是站在一個歷史悠久的「抗衡的傳統」（counter-tradition），在此傳統中，神學的討論並非教會的專利、也不是專業的神學家的專利。[29]可以說，這種神學的合法性，不僅受到相關的文化理論所支持，[30]也是有它在神學的歷史傳統的依據。

其次是漢語神學的文化性或文化使命。在漢語世界的神學論述，過去曾集中在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的會通、本色神學的建立等問題。這類問題經常假設中國文化是等同於傳統的高雅文化、尤其儒釋道的思想，並且更假設本色神學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儘量減低傳統中國文化對基督宗教的阻力，並積極建構一種合乎傳統中國文化的神學，以致基督宗教更能融入一個大一統的中國文化。然而，這種

29. 參Adam Kotsko，《齊澤克與神學》（*Žižek and Theology*; London: T & T Clark, 2008），頁 154。作者刻意留給讀者去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原先由建制內的評論者所扮演的角色，為何竟由建制外的人的來扮演。

30. 正如是次主題中由劉利宇的〈坦納的文化理論及它對當代漢語神學的應用〉及王濤的〈塞杜文化理論的神學意涵：兼論對漢語神學的意義〉兩篇文章，各自從坦納及塞杜的思想去肯定此一合法性。

預設早已無法面對中國的當代文化。這是因為，當代中國的文化可說是一幅十分複雜的圖畫：既有傳統的一面，也有活躍的流行文化；既有本土的文化，也有被殖民化的歷史與記憶；既有根基雄厚的佛教及儒學，也有發展一日千里的神學研究；既有婦女受壓迫的歷史，也有少數民族文化在掙扎求存的現況；既有強大的國家機器進行文化操控，也有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不斷在擴張。而以劉小楓為代表的漢語神學倡導者，既提出對本色化神學的批判，並又提出對國家意識形態的批判。此種批判，不僅涉及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評價，更可能預設了一種對「文化」的另類理解，並又對神學的任務有了一個不同的理解。當中突顯的是，神學的要務，並不是如何致力融入一個大一統的、以高雅的傳統文化為代表中國文化，而是正視當代的中國文化，並嘗試在當中進行文化抗爭，包括對國家意識形態進行批判。[31]這種對漢語神學的理解及其背後對文化的理解，相對於已往的本色神學來說，也許更能對應當代中國文化的現實，並且更能對應當代西方的文化理論，以及採納這種文化理論的神學家、如坦納及沃德的觀點。

第三是漢語神學的公共性。對漢語神學的公共性的關注，多少反映出一個現實，就是基督宗教作為少數人的宗教而存在，而能否及如何可以影響當代中國文化，正是漢語神學的重要課題。其實相類似的問題，也正是文化理論家塞杜以至神學家沃德特別關注的，而西方神學界與文化理論界之間的對話，變相將原來主要是屬於神學的話題，轉換成為一個公共性的議題。由於文化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背景，而當代西方的文化理論家中也不少是有馬克思主

31. 參朱曉紅在是次主題的論文〈身份與想象：多重話語中的郭佩蘭後殖民婦女神學〉（見本書，頁 83-106）及賴品超，〈從文化神學再思漢語神學〉，頁 98。

義傾向，因此中國大陸的學界對這些文化理論家會有一定的認識，這些文化理論家的思想可以提供某種共通的語言或話題，有利於漢語神學界與文化界進行對公共議題的討論。換言之，當代西方的基督宗教研究與文化理論的互動，對思考漢語神學的公共性，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四、主題論文介紹

由於篇幅的關係，是次主題（不計算本文）共收五篇文章，分別由五位背景互異的學者撰寫。香港神召神學院李天鈞老師的文章，率先介紹文化研究與神學的互動，包括文化研究對文化的新觀點，而神學界又如何對此一種新觀點作出種種回應，之後更嘗試從聖靈論的視野思考文化研究及神學的關係，為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提供一個神學上的基礎。依此，神學對文化研究的吸納，並非只是為了趕時髦，而是也有來自信仰或神學本身的要求和根據。

有了此理解的框架，本主題有兩篇文章，分別討論兩位神學家對文化理論的挪用。旅歐華人學者劉利宇教授的文章集中討論神學家坦納，文章指出坦納所依據的，既不是對文化的自然觀，也不是一種高雅文化觀，而是一種人類學的文化觀，而坦納依此文化觀提出她的神學方法論，包括對神學的本質及任務的理解，最後文章更嘗試指出坦納的觀點如何有助思考漢語神學的建構。

來自上海復旦大學的朱曉紅教授的文章，討論美籍華人神學家郭佩蘭的基督宗教研究，是如何採納文化理論中的女性主義及後殖民理論，而這不同的文化理論又如何導致其亞洲後殖民婦女神學中的種種張力，最後文章更嘗試從當代中國的處境對郭佩蘭的神學作出回應。作為美國宗教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的候任會長，郭

佩蘭的名字對於西方、尤其美國的學者來說應不陌生，雖然郭教授曾在香港接受教育及任教，但漢語學界、尤其中國大陸的神學界對她的討論並不算多，朱曉紅教授的文章從中國大陸的處境作出批判性的回應，尤為值得注意。

在討論了神學家如何採用文化理論、而文化理論對神學又有何意義後，我們轉至文化理論家的基督宗教研究。由於篇幅的關係，不能不作忍痛取捨，例如巴迪烏對保羅的討論是十分重要的，對神學也甚有意義，但無法在此詳論。[32]在是次專題有兩篇文章分別討論文化理論家塞杜及齊澤克。

西方學界對杜塞的文化理論的神學意義，已有不少討論，其中以深受塞杜啟發的沃德的討論最為重要。在沃德編輯的後現代神學讀本中，特別留了一條給塞杜，[33]此外他更在神學期刊中編了一期塞杜的專輯，[34]更為重要的也許是由沃德所編的杜塞讀本，[35]當中對塞杜的思想的介紹，更是遠比其他學者對塞杜的導論更為着重塞杜的神學意義。[36]漢語學界對塞杜的譯介並不算多，但當中剛好包括了由沃德編的塞杜讀本。[37]王濤博士的論文，重點討論塞杜的文化理論對神學的啟發，並嘗試闡釋其對漢語神學的意義，除了有助深化漢語學界對塞杜的討論外，更指出了塞杜的理論

32. 有興趣者可參 Frederiek Depoortere，《巴迪烏與神學》（*Badiou and Theology*; London: T & T Clark, 2009）。
33. Frederick Christian Bauerschmidt 導言，Frederick Christian Bauerschmidt & Catriona Hanley 譯，Michel de Certeau，〈今天基督宗教如何可被思考〉（How Christianity Thinkable Today），載 Graham Ward 編，《後現代的上帝：神學讀本》（*The Postmodern God: A Theolog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7），頁 135-158。
34. 《新黑衣修士》（*New Blackfriars*, vol. 77, no. 909 [1996]）。
35. Graham Ward 編，《塞杜讀本》（*The Certeau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0）。
36. 例如 Ben Highmore，《塞杜：分析文化》（*Michel de Certeau: Analysing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6）；Ian Buchanan，《塞杜：文化理論家》（*Michel de Certeau: Cultural Theoris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37. 瓦爾德（Graham Ward）主編，林心如譯，《塞杜文選（一）：他種時間／城市／民族》及《塞杜文選（二）：他種語言／信仰》（苗栗縣三灣鄉：桂冠圖書出版社，2008）。

可以為自居教會建制外的漢語神學的合法性，提供一個文化理論上的依據。

壓軸的朱大成博士，集中討論齊澤克的文化理論及基督宗教的論述中對絕對性的追尋。在是次主題中選擇了齊澤克，這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事；事實上，齊澤克的文化理論與宗教及／或神學的關係，已在西方學界引起不少關注和討論。反觀漢語學界，雖然齊澤克的著作中有不少已有中譯，其中更包括仔細討論基督教的，而專門研究齊澤克的書也有一些，但當中卻較少涉及宗教問題，[38]然而直接討論他的文化理論與神學的關係的中文論著仍是十分稀少。[39]朱博士的論文不僅展示出齊澤克的文化理論及對基督宗教的論述之間的關係，更嘗試從神學的視角評價齊澤克的理論中對絕對性的追尋的成敗得失，有助深化相關的討論。

五、總結

近年神學與文化研究之間有不少的互動。在西方學界，一方面已有一些神學家，例如坦納及沃德等，除了運用新近的文化理論來分析及批判流行文化外，更用它們來思考神學的方法論；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文化理論家，如齊澤克、巴廸烏、塞杜等，深入地討論對基督宗教以至神學問題、包括基督論以至保羅的政治神學，其中齊澤克更與神學家米爾班克展開直接的辯論。此外，更有亞洲神學家嘗試由文化理論中有關婦女主義及後殖民主義的論述，反思亞洲的神學及《聖經》詮釋的問題。這些討論，不僅是

38. 例如韓振江，《齊澤克意識形態理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當中甚少涉及宗教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書的外文書目（頁 332）中，誤將齊澤克論基督宗教的專著*The Fragile Absolute*的副題*Or, Why the Christian Legacy in Worth Fighting For*重覆置於另一本書*The Plague of Fantasies*的書名之後。

39. 參楊慧林，〈對「反向」的觀念與「反轉」的邏輯——對齊澤克「神學」的一種解讀〉，載《道風》32（2010），頁 227-246。

當代神學界的前沿研究，對中國學界、尤其漢語神學更別具意義。

中國學術界對相關的文化理論已有一定的譯介，但這些譯介卻甚少涉及與基督宗教或神學的關係，故本主題將有助中國學術界進一步了解這些文化理論。此外，對於漢語基督教研究、尤其漢語神學來說，本論題更有多方面的意義。首先，這些理論（包括對基督宗教及神學問題的討論）基本上都是出自學術界而非教會界，以此可印證漢語神學所倡議的在學術體制的學術神學的合法性。其次，這些文化理論對文化的理解，有助澄清漢語神學的文化使命。第三，這些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文化理論，將有助思考及建立漢語神學的公共性。[40]

關鍵詞：基督宗教研究　文化研究　漢語神學

作者電郵地址：pclai@cuhk.edu.hk

40. 本文之研究獲香港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的資助（項目編號CUHK445207H），謹此致謝。

Cultural Theory and Christian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AI Pan-chiu
Ph.D.,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any significant exchanges among scholars of cultural studies or cultural theory and scholars of Christian Studies. Some cultural theorists, e.g. Alain Badiou, attempted to explore and evaluate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hristian theology, especially that of St. Paul. Apart from a few with strong religious background, e.g. Michel de Certeau, many of the cultural theorists are not Christians in term of religious affiliation. However, they actively engaged in critical dialogue with Christian theologians. The debate between Slavoj Žižek and John Milbank is one of the notable examples. Some Christian theologians, including Kathryn Tanner, Graham Ward and Kwok Pui-lan, make use of some cultural theories to analyze Christian theology.

There are some apparent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se cultural theorists and the proponents of Sino-theology. Many of the latter are neither professional theologians nor active members of

Christian churches, but very familiar with Marxist philosophy and well aware of the political issues related to culture. They discuss theological ideas primarily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engage in dialogue with church theologians as well as non-religious intellectuals in China.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ultural theory and Christian Studies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are relevant to Sino-theology in several ways. Firstly, the happening of this interplay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confirms the legitimacy of the endeavour of Sino-theology in promoting theological discussion in the academia rather the Christian churches. Secondly, the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with its emphasis on the facture and struggle of ordinary culture rather than the unity of high culture, supports the agenda of Sino-theology to break with indigenous theology, which tends to accommodation Christian theology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o focus on the theological task related to the dynamic and pluralistic cul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cluding the critique of national ideology. Thirdly, the Marxist background of these cultural theories may facilitate and enhance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proponents of Sino-theology and other intellectual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short, the interactions among cultural theory and Christian Studies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may inspire the discussion concerning Sino-theology and deserve to be studied thoroughly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Christian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Sino-Christian Theology